责编：沈辉 E-mail:zydxshenhui@2008.sina.com Tel:010－62806418

◆观 点

中国经济如何爬坡过坎

中国经济成功爬坡过坎，必须稳中求进、改革创新，加强对增长、就业、物价、国际收支等主要目标的统筹平衡，着力提质增效、持续改善民生。

向深化体制改革要动力，释放改革红利。多年来我们已经享受到了人口红利的盛宴，眼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发生变化，通过制度变迁或制度创新能够带来新的收益。改革能够激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是发展的需要，也是突破发展瓶颈制约的关键。2013年以来，简政放权等改革成效明显，分批取消和下放了416项行政审批事项，取消和免征行政事业性收费348项，减轻企业负担1500多亿元，全国新注册企业增长27.6%，民间投资比重上升到63%。

推动经济转型，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转型升级是经济发展过程的客观现象和必然要求，随着经济发展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当原有的发展方式不适应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甚至成为发展的障碍时，就需要调整转型，实现“破”和“立”。也可以说，经济发展过程就是转型升级的过程。推动转型升级的方式就是，使原有的靠投资带动和出口拉动实现的高速增长转变为靠创新驱动和消费拉动的持续稳定健康的增长，使原有的粗放式发展转变为集约式发展。

创新宏观调控方式，确保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区间管理是宏观调控的一种创新方式，我国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下限”就是稳增长、保就业，“上限”就是防通胀。经过认真比较和反复权衡，本届政府把今年增长预期目标定在7.5%左右，兼顾了需要和可能；把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3.5%左右，考虑了去年涨价翘尾影响和今年新涨价因素，也表明抑制通胀、保障民生的决心和信心。此外，还要坚持审慎的宏观调控政策、灵活的微观政策和托底的社保政策等多策协调并举，这样利于保持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增强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

加强金融监管，消除金融领域的风险隐患。当前，我国国内金融形势很不容乐观，由于各种复杂的因素，导致金融脱离实体经济、金融资产错配、资产泡沫放大、影子银行规模扩大等。去年上半年，银行闹“钱荒”，在货币信贷总量相对宽松的情况下，银行业出现流动性异常，大量货币通过影子银行输送到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直到目前，我国广义货币存量已突破100万亿元，货币存量与GDP之比已达到200%，资金使用效率连年走低，金融领域的风险隐患仍在不断积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需要健全金融体系，拓宽民间资本投资领域，发展普惠金融，推进利率市场化等，必须杜绝金融脱“实”向“虚”，靠钱生钱。

总之，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特殊的转型时期，既面临重大挑战，也蕴含重要机遇。只要宏观上审慎决策、微观上灵活应对，解决和化解好这个时期所暴露或隐含的各种问题和风险隐患，那么增速换档的压力、转型调整的阵痛是可以承受的，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稳定健康增长是可以预期的。（2014年第11期《人民论坛》张占斌）

瑞士人为啥不要全球最高的“最低工资”

据报道，福利“高大上”的瑞士近日迎来全民公投，决定是否应该设置月薪4000瑞士法郎（约合2.8万人民币）的“最低工资”。如果通过，瑞士月薪将“傲视”全球。但最终结果显示，76%的选民不支持最低工资制度。

之所以反对“多挣钱”，投票者心中自有一本账：如果实行这一最低工资标准，则意味着企业为控制成本，势必减少雇员数量，而收入低、技能也低的那部分劳动者，将成为首当其冲的牺牲品。简而言之，投反对票的民众意识到，公投一旦过关，最终的受害者反倒可能是那低收入的10%，推动公投的初衷是帮助他们，而实际效果很可能与初衷背道而驰。

不仅如此，许多投反对票者还指出，一旦实行了这样的标准，那些原本就缺乏劳动技能和就业市场竞争力的人，可能会因此躺在最低工资保障上不思进取，最终导致瑞士整体竞争力的下降。

瑞士是老牌发达国家，民众受教育水平和素质在全球范围内是公认较高的，很显然，他们最终选择了政府和经济界希望他们选择的选项，是经过慎重、理性考虑的。自2008年爆发的欧洲金融危机，受害最深的，无一例外是实行最低工资标准最积极、“大福利”面面俱到的国家。瑞士是个多语种、多民族国家，境内有为数不少讲法语、意大利语的瑞士人，正所谓殷鉴未远，他们当然会从相关国家的际遇中，获得投票选择的启示。

此外，最低工资标准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个有争议的事物，尽管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普遍设立了这一标准，但不少商界人士指出，最低工资标准并不能保障弱势群体利益。以加拿大卑诗省为例，将最低工资标准从8加元每小时提高到11加元每小时，初衷是提升低薪者的收入水平，但结果造成当地服务业纷纷裁员，许多低薪者反倒因工作时间缩短而收入下降，而那些小商业的业主又抱怨，增加工资标准水平导致小本经营的他们成本增加，这从长远看，未必对市场、经济和就业有利。

正因为此，德国曾长期在是否设立最低工资标准问题上犹豫不决，一些国家虽设立这一标准，但执行留有余地。此次瑞士公投的结果，证明普通民众对最低工资标准，也开始有渐趋一致的认识。（2014年5月20日《新京报》陶短房）

◆文 坛

明代文人中的狂人

历代狂者，多是独立苍茫，兀自呼喊。如西晋的阮籍穷途歌哭，一句“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惊人语，从气势上压倒当世所有文人。有明一代，文人染“狂”病者，却远远超过了其他朝代。

元明之交，中原板荡，王纲解纽，为个性意识的滋生提供了适宜的气候条件。明初才子解缙上万言书，无所避忌，敢于对嗜血狂朱元璋的朝政评头品足，真可以说是“刀尖上跳舞”。大学者方孝孺当着朱棣的面，拒绝起草诏书，执笔写下一个大大的“篡”字。

文人张狂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高大的自我。这种个性意识到明中叶以后，蔚成一股潮流。我们所熟知的唐伯虎，并非周星驰饰演的那样风流自赏，在红粉丛中游刃有余。他因科举舞弊而与官场绝缘，从此穷愁潦倒，却少了屈身低眉的妾妇气，“一日兼作两日狂，已过三万六千场”。

徐文长虽名头不及唐伯虎，但才华横绝一世，以至于齐白石甚至想早生三百年为其磨墨理纸。他同样半生落魄，托足无门。晚年竟多次自杀。有时居然自己拿起斧头，“击破其头，血流满面，头骨皆折”；有时用锐利的锥子，“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他正是要通过这种疯狂的举动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

与徐文长相比，李贽命途也多舛，但他张狂之中更多了几分叛逆。在书院讲学，遇到峨冠博带的道学先生拿经书提问时，他就一拂袖说：“此时正不如携歌姬舞女，浅斟低唱。”落发念佛，他却不受戒，照样喝酒吃肉。当时出家人中像李贽一样的狂僧有很多，他们呵佛骂祖，率性而为，用自己的真性情来对抗时代的虚伪与堕落。

在76岁那年，李贽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被人用门板抬到京城入狱。他没有向当权者低头，抱着必死之心，用剃刀自断咽喉，血流遍地，气息两日不绝。侍者问他：“痛否？”他以指蘸血写道：“不痛。”侍者又问：“你为什么要自杀呢？”李贽又写道：“七十老翁何所求？”李贽的血性刚烈使“吾道不孤”。他的学说、作品在当时拥有大量的信徒和读者。

明代文人以张狂的举动，以惊世的才华，以骇俗的言论，在封建专制的罗网里，堂堂正正地写就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字。他们用极其痛苦的存在，向后人证明，这个世间他们曾经来过、活过，也精彩过。（2014年5月10日《科技日报》李国锋）

◆纵 横

向新加坡借鉴什么

新加坡自1965年建国至今，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将一个拥挤落后、遍地贫民窟的城市，建设成高度现代化的城市国家。李光耀先生以强人政治方式创建的新加坡，一方面人民行动党始终保持着其一党统治的执政地位，另一方面建立了稳固有效的民主执政体制。在战略发展的大视角下，新加坡不乏值得中国学习与借鉴的经验。

经济发展面向世界。作为一个城市国家，新加坡唯一可利用的“自然”资源，是人力及其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据此，新加坡在立国之初就制定了面向世界的发展战略，将自身的经济发展与全球经济紧密相连。第一，新加坡以世界发达经济为标准，建立并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在此基础上健全法律制度，建立并严格实施各项经济法规和准则。第二，全力打造一流的基础设施，创造优质安全的生活、投资和工作环境，对人才管理、物流进出都制定严格的制度规范，促进竞争，提高效率，增加对外资和外企的吸引力。第三，根据新加坡具体条件，优先发展航运仓储、金融服务、石油油化、生化制药、酒店客运等高附加值、低污染、低耗能的产业。第四，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保持低价便捷的营运服务。这些举措使得新加坡在短期内迅速成为亚太地区贸易、航运、金融和交通的枢纽，同时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使新加坡的经济竞争力始终保持在世界前列。

政治发展注重制度化建设。新加坡自建国以来，亚太地区的战略环境瞬息万变，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长期滞后于新加坡，政治局面也不甚稳定。同时，新加坡在族群、文化、宗教、语言等各方面都高度多元化。在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下，新加坡却能够始终保持国内政治稳定，人民团结，关键在于其强力有效的政治体制。其一，权力的制度化。即最高公共权威的非人格化——宪法代表政治体制中的最高权威。在宪法的规范下，权力的设置、授予、更替、运作、分配，以及各权力机关之间的关联与互动等，都是由严格的制度来界定和规范的。其二，政策制定的制度化。任何政策的制定，从政策的建议到具体政策的形成，都要经过一个固定的、不可随意更改的程序。其三，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各种政治参与形式——选举、集会、抗议、听证、游行、报告等涉及广泛民众参与的政治活动，都必须依法按照既定的制度进行。新加坡自建国以来始终不懈地抓紧以上三个“制度化”的建设。因此，尽管长期以来保持着一党执政的局面，但不论在人民的政治生活的参与程度、范围、深度上，还是政策制定方面，新加坡的政治运行始终都以民主的方式进行，在保持了政治长期稳定的同时，也保持了政府的高效、清廉和政策制定的有效性。

以“居者有其屋”为核心政策的社区建设。新加坡作为一个城市国家，没有广袤的农村，从建国伊始就确立了向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建国路线。因此，新加坡始终将“居者有其屋”作为最重要的国策，从而为长期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古今中外的历史发展均表明，在任何国家和社会，一旦出现大批居无定所、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必将发生动乱以至革命。在任何社会，发生大规模的革命需具备三个必要条件：第一，大多数人贫穷到一无所有；第二，人民对今后的发展普遍绝望；第三，政府不作为，其治理的水平和效率都极其低下。新加坡的“居者有其屋”政策，使得绝大多数新加坡人有了属于自己的稳定的居所，从一开始就培养了“有所失”的中产阶级，使其成为了推动经济发展、维持政治稳定的中坚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加坡的“居者有其屋”政策不仅仅从经济意义上保证了社会的健康发展，也充分体现了从决策到实施中的民主政治，调动了广大新加坡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与有效性。

重视教育，注重人才的引进和管理。新加坡政府认识到人才在政治、经济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整套人才的教育、选拔、管理和引进制度也因此形成。新加坡真正地做到了教育“从娃娃抓起”，由国家为具有各种特殊才能的青少年提供各类奖学金，通过最好的教育使他们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培养和发挥，并将教育中人才的选拔和培养与人才的使用连在一起。人才选拔制度是新加坡一项十分独特的制度，使得新加坡在建国近50年来始终能够确保人尽其才，让优秀人才在政治、经济、管理等各行各业充分发挥其才能和作用。在新加坡，无论是自己培养的人才，还是被引进的人才，都被置于一个公平的、高强度的竞争环境下。

对腐败的有效控制。新加坡最引人瞩目的文明发展成就之一，就是其对腐败的有效控制，在政府的廉洁有效方面，长期高居世界前列。新加坡在打击腐败上绝不手软。首先，新加坡建立了三个十分值得借鉴的机制：一是政府设立了独立于各级主管的监督、考核官员的公共服务委员会，对各级官员进行制度化的监督；二是通过民众的积极参与来进行监督；三是通过媒体及时的跟踪报道来进行监督。这三个机制确保了整个监督系统的制度化、常规化、透明化。其次，成立了不受任何权力制约的腐败调查机构——反贪局。一旦在反贪局立案并进入调查程序，在得出最终调查结果之前，包括总统、总理在内的任何人和任何机构都必须回避，不得以任何形式过问和干预调查。其关键的一点，是通过制度化的方式确保对腐败调查和处理的独立性。

通过“接地气”的政府运作扩大政治参与。新加坡政府通过制度建设，保证执政深入到社会的最基层。其中，选举和议会的作用最为关键。一方面，议员的选举在各个选区中定期、公开进行；另一方面，议员在选区中设置办公室，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接受选民的访问，并通过议会代表将选民意见及时地转达给各级政府，以定期“问责”包括总理在内的各级政府官员的方式，敦促政府拿出解决办法。这样，政府在执政过程中始终与社会紧密联系，保持高度的“接地气”。值得关注的是，新加坡自建国以来，人民行动党的党员身份上自总理，下自基层干部，党员身份从不对外公布，党的各项活动也以秘密形式进行。其根本目的，是将执政党变成执政过程中的隐身人，从而凸显法律和政府在施政过程中的主导地位，而执政党的主张和作用则“隐性”地贯彻于政府的各项功能和法律的实施当中，最大程度上避免了执政党用生硬的政治手段获取自己的利益。

毕竟，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其政府规模较小、各阶层利益趋同、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相对划一、发展水平较高。因此，从政策制定、实施到政府行为，它的经验都很难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所用。但是，新加坡在法制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化确保了经济发展的长期稳定、政治运作的民主机制、人才管理中的有序竞争、政治参与的理性进取、反腐机制的独立公正、执政过程的联通“地气”。这为其政治的长期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制度上的基础。凡此种种，都十分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2014年4月下《学术前沿》黄靖）

◆史海钩沉

中日外交的国书博弈

小野妹子是日本飞鸟时代（约600—710）推古朝的外交官，公元607年作为遣隋使携带国书来拜见中国皇帝。不过，这个过程却不那么顺利。

当时的中国皇帝是素以讲排场闻名的隋炀帝。听说远在海岛之上的倭国国王不远千里遣使前来朝拜，隋炀帝非常高兴，下令对使节热情款待，甚至长安城也要大肆装点，以显示中华的富饶。几天后，小野妹子一行就接到了通知，上朝拜见隋炀帝。可是，当隋炀帝铆足了精神，端起了架子打算好好享受享受日本来使的阿谀奉承之辞时，却看到日方国书的第一句：“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

隋炀帝的火立即就起来了：嘿！你在日出处，我在日没处，这是什么意思?！而且更严重的是，小小倭王居然敢自称天子，这就更让人火大！须知天子只能是“男一号”，最高统治者才能称天子，作为臣国，当然不能僭越！

隋炀帝当时就想发作，但是考虑到毕竟人家跋山涉水，辛辛苦苦地来了，面子上还是要过得去的。于是，隋炀帝只是吩咐鸿胪卿（管外事的官员）：“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以后蛮夷的国书有不像话的，就不要再给我看了，省得自找没趣儿！

当时的日本，情况已经与以前不一样了：大和民族国家业已形成，民族自尊心不断增长，它已经不愿像从前那样以藩属的身份与中国交往了。但是，在隋炀帝的眼中，日本与其他倾慕中华的小藩没什么区别。

话虽如此，日本的国情还是需要了解的，于是隋炀帝便从大局出发，派遣出身名门的裴世清作为使节与小野妹子一起回访，以了解日本的情况。

中国使节即将来日的消息传到日本后，日本朝野上下顿时陷入一片忙乱之中。因为日本方面没有想到“西方礼仪大国”居然会派使者回访！

据史料记载，裴世清一行于公元608年6月15日到达日本难波，可是直到50天后才进入京都。之所以耽搁了这么长时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日方感到自己接待外交使节的馆舍太寒碜了，尤其要迎接的不是一般的使节，而是中华的贵客。于是推古天皇（558—628，女，日本第33代天皇）下令，在大阪原来接待高丽使节馆舍的基础上大肆装修一通，以免被中华贵客看轻了。此外，日本政府还派出30艘彩船迎出很远。这些铺张的行动，除了表示对上国来使的尊敬之外，其中也暗含了展示国力的成分。

据《日本书纪》记载，小野妹子归国后，没有把隋炀帝交给他的国书递交上去，而是声称在朝鲜半岛被百济人给抢走了。于是，马上有人建议从重处罚小野妹子。后来推古天皇认为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时刻，如果处罚小野妹子，“大国客等闻之亦不良”，于是就把这件事给按下了。

那么这份国书真的让人抢走了吗？对此，学界主要有两种看法：一是当时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国书确实被抢走了；二是国书里面很可能有隋朝方面对日本国书无礼的斥责，小野妹子担心把天皇惹毛了，有可能会导致中日修好失败，自己也会遭到严重处罚。于是，这封国书就“被失踪”了。

在后来裴世清呈上的国书中，果然有令日本国不快的内容。

推古天皇以非常隆重的礼节会见了中华来使，并且态度十分谦恭。隋使裴世清呈上了国书，国书中的第一句是“皇帝问倭王”，这是典型的天朝上国对小番邦的口气。当时摄政的圣德太子看到这份国书时面露不悦，这等于是把他们天子降格了，估计他的心情应当与当初隋炀帝的心情一样，也是很不高兴的。裴世清还解释说，这是给诸侯书信的固定称呼，“赐诸侯书式也”，这让日本方面更加不高兴。

尽管日本方面对这封国书颇为不满，但是不满归不满，交往还是极有必要的，加之日本要向中国学习的东西很多，所以没有或者是不愿过于计较国书的礼节问题。

中华使节裴世清回国之时，日本方面热情地饯行，小野妹子则“戴罪立功”，护送隋使归国并再次出使隋朝。小野妹子等人到达隋都长安后又向中国朝廷递交了一份国书，他心中相当没谱：谁知道这次又会横生什么枝节？

果然，令小野妹子担心的事情发生了。问题还是出在国书上。这次小野妹子带来的国书据说已经是“改进版”了，是由汉文化造诣很深的圣德太子亲自审定的。在双方的称呼上，为了既不惹恼隋炀帝，又凸显己方追求对等的用意，圣德太子大费苦心，纠结了很久，最终整出来个新称呼：称隋朝皇帝为西皇帝，日本倭王为东天皇。

可是，国书走到鸿胪卿这里却卡住了：什么“东天皇”！此前有“最高指示”，即“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所以鸿胪卿干脆就把这封国书“截留”了。

此后，日本方面又多次派遣使节，前来学习中华的文物典章、政治制度。唐朝建立以后，日本继续派遣使节。最终，在充分吸取中华文化的基础上，日本搞出了一个“大化改新”，使社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对此，小野妹子是有功的。

小野妹子在经历波折，完成使节任务后，似乎有了某种感悟：官场之上，波诡云谲，实在不是一己之力所能控制得了的。于是，他辞官不做，皈依了佛教，居住在圣德太子创建的六角堂寺院内的池坊，潜心修行，从此过上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佛祖书”的自在生活。不过，毕竟是场面上混过的人，在修行之余，小野妹子还借鉴吸收中国佛教供花艺术的精髓，结合日本的审美趣味、风俗习惯，制定出一整套祭祀时插花配置的规矩，从而创建了日本的第一个插花流派——池坊流。（2014年第3期《文史博览》李方恩）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邮政编码：100091 社长兼总编辑：谢春涛 常务副总编辑：钟国兴 广告部电话：62805980 62806380 发行部电话：62806227兼传真 总编室电话：62805368 62806234 电子信箱：xuexishibao@126.com
定价：全年180元 邮发代号：1—267 国外发行代号：W3970 开户银行：建行北京中关村分行 户名：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 账号：2613000456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海工商广字0301号 承印：人民日报社印刷厂